

彝族文学史

YIZUWENXUESHI



四川民族出版社
SICHUANMINZUCHUBANSHE

绪 论

早就该有一部独立的《彝族文学史》了。

我国现有55个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缔造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在文学艺术上，各民族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瑰丽多姿的中国文学，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人口6572173人，在全国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回、维吾尔、苗、满等民族而位居第六。彝族文学无疑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中国文学史》，理应包括各民族的文学在内。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文学体系。目前通行的几部文学史，基本的框架仍然是“汉文学”的框架，基本的脉络，也主要是汉文学发展的脉络，这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了许多缺憾。

斯大林说：“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根本特性，都有那种只能为它所有而为其它民族所无的特色。这些特性乃是每一个民族带到共同的世界文化宝库中使之充实及丰富起来的贡献。”彝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据考古发现，彝族所居住的金沙江流域，是早期人类演化的一个重要地

区。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出土的腊玛古猿化石和与禄丰毗邻的“元谋猿人”化石的发现，轰动了全世界。特别是“元谋猿人”，其活动的年代，比“北京猿人”整整早一百万年。事实证明，彝族人民世居之地，乃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在这样悠远的历史进程中，彝族的祖先为开发云贵高原和康藏高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在这广阔的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创造、谱写了光辉的历史和文化，充实和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

高尔基说：“苏维埃的文学，不仅是俄罗斯语言的文学，它乃是全苏联的文学。”他告诫我们说：“我们没有漠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权利，虽然我们比他们的人多。艺术的价值不是用量而是用质来测度的。”彝族文学，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彝族文学史》的撰写，一定能以其独有的风姿和色彩，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艺百花园锦上添花。

—

彝族，历史悠久，文化古老，其先民是与氏羌有渊源关系的“昆明人”。两千多年前，彝族的祖先便生息在四川安宁河流域、金沙江两岸和云南滇池及哀牢山等地区。彝文的典籍记载了比“昆明人”更为古老的初民生活，为我们认识古代社会提供了可贵的文字依据。大约生活于南北朝至唐代的被彝族人民称为“圣母”的女诗人阿买妮说，古时候，“猴和人同住，人与猴不分，将猴当作人，猴死还作斋”。这里记载的，如果不是“类人猿”，至少也是“类猿人”的生活。那时的“人”

与“猿”，从形态到生活方式都不容易分清。而《西南彝志·创世志》则说：“人们在当初，不曾住地面。野兽花斑斑，跑在森林里。人居于树上，兽与人同住，人与兽相随。”初民的生活，大抵如此。这与汉族传说中“有巢氏”、“构木为巢”很相近，且描绘得更加具体。此后，“人到地面来，没有粮食吃，吃草籽树果；没有衣服穿，穿的是兽皮”。这表明人类社会还处于采集和狩猎经济时代（其实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人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粮食，人类尚处于蒙昧时代），与“神农尝百草”情景颇为相似。当时，人类尚处于母系社会的发展阶段：“从前天地间，男的不知娶，女的不知嫁，知母不知父。”这是人类处于群婚时代的真实记录。彝族文学中，流传着许多“生子不见父”、“找父”、“买父”一类故事，如彝族史诗《勒俄特依·施尔俄特》就反映了这一现象。这些故事反映的是彝族从母系制社会向父系制社会过渡这一漫长而又艰辛的历史进程。《西南彝志·谱牒志》具体记述了从希慕遮到笃慕和笃慕后六祖以下的主要家支世系。这些家支世系是按照“父子连名”制记载的。所谓“父子连名”，即在儿子的名字之前必须连结父名的最后两个或一个音节，父父子子世世相连，犹如一根长长的链条，把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串连在一起。无疑，“父子连名”表明彝族社会的“父系制”得到确立。彝族父系制的建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史记·西南夷列传》说，从今洱海一带，东至滇池，北抵四川西昌，“地方可数千里”的广大区域之内，居住着“僰人”和“昆明人”，他们已被确认为彝族的先民。虽然他们尚处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状态，但社会的发展，已进入原始社会

末期，随着父系制的确立，私有制便逐渐孕育成熟，彝族社会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

汉、晋和南北朝时期，彝族先民的居住区域不断扩大，《华阳国志》记载，“昆明人”成为包括今天云南、川南、黔西、桂西在内的“南中地区”的“夷人”的称谓。在这些“夷人”中，已分化出“夷帅”，而“夷帅”正是“昆明人”部落中的贵族阶级的代表。这些“夷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利和地位，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千方百计与汉族大姓通婚联姻。彝、汉的上层通过婚姻关系实现了政治上的结合。历史上把这些人称为“南中大姓”。诸葛亮平定南中，遭到了孟获、高定、雍闿的联合反抗。孟获、高定、雍闿，就是当时夷、汉合流后的“南中大姓”。

“南中大姓”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争斗，经过激烈的火并，爨氏实力大兴，终于称霸一方，成了云南的实际统治者。历史记载，爨氏家族的辖区，有东西二爨。二爨之间生产发展不平衡，其中东爨为“乌蛮”，其统治者称为“鬼主”（大部落为“大鬼主”，小部落为“小鬼主”）。他们“散居林谷”，畜牧业比较发达，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则相对落后。“土多牛马”，“无布帛”，便是他们生产力水平的真实写照。由于他们身处高山深谷，交通阻隔，接受外族特别是汉族文化影响较少。后来有人向朝廷上疏说云南地处“绝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来及于后汉，不与中国交通”，即指的就是这种封闭之状态。这严重影响了“东爨”经济的发展。而“西爨”，即“白蛮”，主要生活在坝区，土地较平坦、肥沃，农业经济比较发达，水稻成为主要的农作物。由于交通方便，城邑商业得

到了一定的发展，文化思想相对开放，能积极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史载西爨地区“户口殷实”，“邑落相望，牛马蔽野”，“收获亦与中原同”，说明其生产和文化的发展，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唐代南诏国是由彝族先民建立的云南地方政权，在云南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公元8世纪以前，洱海附近出现了六个彝族先民的乌蛮集团，史称“六诏”。居住在哀牢山的蒙舍诏位于其他五诏之南，故亦称“南诏”。公元738年前后，南诏皮阁罗兼并各部，“尽得洱海河蛮故地”，被唐朝中央封为“云南王”。此后，南诏“合六诏”、“破吐蕃”、“和诸爨”，日益强大。公元748年，阁罗凤袭云南王后，南诏很快统一了云南及今川南、黔西、桂西部分地区，建立了南诏地方政权，结束了西汉以来四百多年大姓纷争的战乱局面，对云南地方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南诏政权属于奴隶制。南诏王是最高统治者，操纵着全部土地和大量奴隶。他把这些土地分配给王族和军事首领。奴隶劳动时，“遍令监守催促”。生产出来的产品，少数用于维持奴隶的最低生活，其余均被奴隶主攫取。为了增加奴隶劳动力，南诏王室多次发动战争，掠战俘为奴，并盛行着奴隶买卖。

南诏灭亡之后，云南相继出现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三个短暂的国家。公元937年，白族段思平联合东爨37蛮部乌蛮，消灭了大义宁，建立了大理国。大理国地方政权的王室是白族，但所属人民仍以彝族为多。大理国建立后，“更易制度，损除苛令”，实行封建分封制。这种以农户多少，以个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分封制，适应了奴隶制经济的封建化过程。因

此，大理国基本上是一个封建领主制的地方政权。在大理国统治的三百多年间，彝族社会逐渐向封建领主制转化。元代，忽必烈平定大理国后，在云南建立了行省，蒙古贵族对原“大理”旧主备加重用，彝族首领都被授以路、府、州、县的土官。这些土官，既是当地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土地的世袭所有者，当然也就变成了世袭的封建领主。明代因袭元朝土司制度，使之更加完善，在彝族地区任命了一批世袭的土司。与此同时，明王朝又在云南广设卫所，从内地迁来大批汉族进行屯垦。屯垦的汉族人民与彝族人民交错杂居，民间经济、文化交往频繁，推广了内地的生产经验和冶铁、牛耕技术，兴修了水利，引进了包谷、洋芋等新的农作物品种，开发了广大山区，促进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

明末清初的“改土归流”，对发展民族固有文化产生了不良影响。但是，这项措施对促进彝族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改土归流”后，废除了县以上土司的特权，促进了彝族地区封建领主经济的解体，有利于封建地主经济的确立，使坝区和半山区的彝族，在地主经济的发展上，接近或达到了汉族的发展水平。但是，由于这场改革的不彻底，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土司虽然废除了，土目却依旧存在。所以，金沙江沿岸一带边远地区，还残存着以土目为代表的封建领主制经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彝族人民也深受其害。为反抗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哀牢山彝族雇农李文学响应太平天国革命，于1856年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彝族史和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此后，帝国主义对彝族人民的侵略变得更加隐

蔽而阴险了。一方面，他们在彝区鼓励种植鸦片，用枪支、弹药和白银交换鸦片。帝国主义者以这样的手段逐渐实现了对彝族中反动势力的控制。少数边远山区，甚至恢复了贵族奴隶主的野蛮统治。另一方面，他们加深了文化侵略，在彝区建立教堂发展彝族教徒，开办“神学院”，培养彝族神甫。他们利用彝族文化中的某些东西，宣传教义教规。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留下了许多不良的思想影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之下，彝族人民积极投入了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1935年至1936年，红军北上抗日，途经彝族地区，受到了广大彝族人民的欢迎。彝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小叶丹与刘伯承同志结盟，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佳话。许多彝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解放战争中，哀牢山区和乌蒙山区的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了游击武装，开辟游击区，在彝族聚居地区，积极开展“反三征”运动（征兵、征粮、征税），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进军云南。在彝族上层龙云先生的影响和省主席卢汉先生的组织下，彝族同胞为实现云南的和平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彝族人民终于获得了翻身解放。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历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从此，祖国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彝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翻了身。面对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光辉灿烂的前景，彝族人民用口和笔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给予了表现和反映。

二

文学史的分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以社会历史的分期作主要依据，还是以文学自身发展的状况作主要依据？这在汉族文学史的撰写中也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彝族文学史的研究刚刚起步，由于占有的资料不全，文学发展的面貌还需作进一步的揭示。更何况彝族地跨川、滇、黔、桂四省区，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许多学者对彝族社会发展的看法也不一致，这都给彝族文学史的分期带来了困难。

但是，作为一部初具形态的文学史，对其发展状况作一个大概的描述还是必要的。尽管有困难，我们还是可以采取既考虑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又兼顾彝族文学发展状况的原则和方法，对彝族文学的发展作一概略的划分。

我们大体将彝族文学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四个时期。

（一）原始社会时期文学（？——公元前205年）

这一编所评介的主要是前阶级社会的文学，这是彝族文学的“童年时期”。文学从最早的“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向文学意识的逐步过渡。这个时期的文学内容主要是反映人与自然的斗争，天真地解释“开天辟地”、“人类起源”和“民族由来”的“根古”。作品包括远古神话、远古传说、远古歌谣和创世史诗。这是一个神话的时代、史诗的时代。

（二）奴隶社会时期文学（公元前205年——公元1279年）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彝族的原始社会逐步解体，并开始

了“强者为君，弱者为奴”的时代^①。据文献记载，约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先后进入阶级社会。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而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有的部落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已经过着“耕田，有邑聚”，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②，进入比较发达的奴隶社会；也有的部落，在公元1世纪以前，仍处在“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游牧不定的原始社会阶段^③。但各部落中已开始分化，并在“姓”和部落之间建立了隶属关系。这些都可能是彝族从原始社会逐步过渡到阶级社会的一些痕迹。奴隶社会时期文学，大致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萌生、发展的。

彝族文学从“不自觉”到文学观念的觉醒，经历了漫长的远古时期。彝族文学觉醒的主要标志，是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彝族诗文论》的诞生。这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成书年代约与刘勰《文心雕龙》相当。这部著名的理论著作，论述了诗歌创作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如作诗与写史、诗歌与故事的区别。作者举奢哲认为，写史要求完全真实，艺术创作则允许想象、虚构。即便是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也只能“七成真三成虚”。与举奢哲同时的女诗人阿买妮则认为，诗首先要有“主旨”，“无旨不成诗”。其次，必须有“诗骨”，即“写诗抓主干，主干就是骨”。另外，诗歌还要有文彩，要有深刻的含意，“诗义太浅陋，情文不相生”。并且指出知识乃是诗歌的源泉。他们论述了诗歌要反映现实生活并寓

① 《西南彝志》卷六。

②③ 《史记·西南夷传》。

褒贬于其中的原则，从而揭示了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最后，他们强调诗歌必须讲究韵律的特点，要求遵守诗的格律，协韵对仗，做到“押韵又协声”。对各种诗歌的体裁和诗的写作技巧，他们也有独到的见解。他们要求诗要写得各篇都有“情感的差异、色彩的区分”。总之，这是一部全面论述彝族诗歌的诗学，构成了彝族诗歌理论的体系。这部著作的诞生，标志着彝族文学意识的深刻觉醒，是总结彝族奴隶社会诗歌创作的经典之作。

这时，彝族文人“毕摩”的创作活动更加活跃。他们用彝文记录并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同时，民间口头创作的各种歌谣也日趋繁荣，特别是彝族长诗的创作，进入了黄金时代。这是彝族书面文学繁荣的时代。

彝族是一个具有古老文字的民族。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更需借助文字作媒介来进行创作和交流。彝族奴隶社会时期的文学，主要是靠口耳相传。但是，当古代文学的创作已经达到了一定数量，借助文字记录，便成了必然的趋势。毕摩是彝族的知识分子，他们能熟练地运用古彝文。正是靠着他们的努力，古代有许多作品才得以流传下来。这便是彝族书面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但是，由于古彝文同音同义字多，通行比较困难，使用也不够方便，这又造成了书面文学的缺陷。彝族虽然有文字，但总不如彝族语言那样丰富完整。借助这样的文字来记录和创作，当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书面文学的诞生，对于口头流传来说，是很大的进步，但由于文字的先天不足，也给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

（三）封建社会时期文学（公元1279年——公元1949年）

这一时期包括大约从元朝初期到新中国建立前的文学创作。这段时期，彝族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各种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文学创作的题材转向现实生活，比较注重反映社会矛盾。同时，文学形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除韵文体文学继续发展外，散文体文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样，文学的题材更加贴近生活，文学的形式更加贴近人民，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在此期间，民族间的交往频繁，相互的交流、影响、渗透更加突出，创作十分活跃。从长诗到歌谣，都有了新的发展，民间故事成了彝族文学的重要样式。

（四）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公元1949年——1986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各族人民以豪迈的步伐跨入了崭新的时代。翻身解放的彝族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以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和新的战斗姿态，为建设家乡，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解放前贫穷、落后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治、经济上的彻底翻身解放，使彝族人民心花怒放，他们引吭高歌，歌唱党，歌唱领袖，歌唱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解放后彝族民间文学，以颂歌为基调，这是新时期彝族人民口头创作的重要特征。这一时期的诗篇，感情真挚热烈，语言朴实无华，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标志着彝族民间歌谣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彝族人民对新社会怀着诚挚深厚的感情，社会主义时代新生活的一切美好事物，都能拨动他们的心弦，触发他们的灵感。因此，反映在颂歌中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

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建国

至今，出版的创世史诗、长篇抒情诗、叙事诗数量相当可观，作品分布的地区也很广。继公元1944年光未然搜集整理的《阿细的先基》之后，建国不久便记录整理出版的《阿诗玛》，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此后，还相继出版了《梅葛》、《查姆》、《勒俄特依》、《洪水纪略》、《漏卧鲁沟的婚礼》等等作品。50年代出版的哭嫁歌《妈妈的女儿》、《我的幺表妹》等长篇抒情诗，也颇有特色。

建国数十余年来，新的一批彝族作家和民族文化工作者迅速成长，是彝族文学在新时代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他们当中无论是专业作家，还是业余文艺工作者，都是在党的直接关怀培养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新人将满腔的革命热情凝聚笔端，将火热的现实生活尽收眼底，或以诗歌，或以小说，或以散文，描绘彝族家乡山水田园的旖旎风光，展示彝族人民特殊的风土人情，颂扬彝族人民崇高的思想品质……，他们的文学创作，一般都继承了彝族传统文学的特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同时又逐步形成个人的艺术风格。他们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还对本民族的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彝族作家借用汉文进行创作，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李乔同志的《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醒了的土地》、《早来的春天》、《呼啸的山风》），为彝族文人文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此后，李纳、苏晓星、普飞、吴琪拉达、吉狄马加等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诗人相继从文坛崛起，把彝族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三

彝族的文学遗产十分丰富。按其表现形式划分：有韵文体和散文体两种类型。

彝族韵文体文学非常发达，几乎各个彝族地区都有自己的民间诗人，有许多优美动人的史诗、长篇叙事诗、民间歌谣。这些诗歌，无论是口头流传的，还是通过古彝文记载的，都是以“写本”形式记录的，一般都有着长久的历史。它们经过世世代代的传诵，经过无数不知名的诗人的补充和润色，成为彝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彝族的神话和神话史诗：

被认为是各民族文学源头的神话，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了文学发生学研究的“热点”。各民族的神话，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的古代生活之“谜”。各个学科的大师们，都对神话的研究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他们都试图对神话的起源和发展，作出合乎自己理论体系的解释。古希腊的哲人最早开始了这种猜测。他们中有人主张，神话不过是一种“寓意”，是为了表达某种“隐喻”而“杜撰”的。有的人则认为，神即“古代君王”，神话不过是“历史事件”的反映。议论莫衷一是。“神话学”的研究，从它诞生那天起，便分道扬镳了。此后，众多学派蜂拥而起。“神话学派”、“语言学派”、“社会学派”、“流传学派”、“心理学派”、“人类学派”……都把自己的视野和研究触角，投向了神话这古老而又神秘的领地。各种惊世骇俗的理论，使人应接不暇。神话学的研

究，为神话的起源，即文学的发生，提出了各种假说，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空间。然而，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用汉文记载的神话资料零散而不完整，记叙往往偏于概括而不具体。因此，我们对神话的研究长期以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本世纪30年代前后，茅盾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对片断而又芜杂的神话材料作了认真的梳理，才提出了较为完整而系统的神话学理论。

茅盾发现，造成中国神话资料残缺不全、信度不高的原因是，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演化”。这种“演化”表现在四个方面：历史化、哲学化、宗教化、藻饰化。神话“历史化”的结果，留下来的“既非真历史”，也“失去了真神话”；而“藻饰化”即“文学化”，则“损伤了原始神话的质朴性”；“哲学化”把神话当作“寓言”引用，便“改变了神话的内容”；“宗教化”，也使一部分中国神话变了质。总之，汉文学中记载的神话，“几乎没有一条不是经过修改而逐渐演化成的”。而神话的演化，对中国神话的保存与发扬，自然是一种“厄运”。由于“演化”程度的不同，它把中国的神话分成了“真正的神话”、“次神话”、“变质神话”和“冒牌神话”几种类型，并为各类神话材料的鉴定提出了标准。

神话演化的情况，在彝族文学中尚未发生。彝族神话一般地都比较完整，较多地保留了其原始、质朴的本色。在神话中，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不仅有神，也有具有神性的人间英雄，它们是原始初民在自然界的沉重压抑下，在人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感性领悟和感情体验的产物。同时也是人们自主意识及主体价值的初步显现。彝族神话与彝族的原始宗教一道，孕育了

彝族的原始哲学，彝族神话是彝族的古代百科全书。

在各民族中，开辟神话往往是神话的第一页，它是对“天地缘何而起，人类缘何而来”的探求和解释，集中地表现了原始人的宇宙观。彝族的开辟神话色彩斑斓，想象丰富，它构成了彝族文学中最辉煌的篇章。

彝族史诗《梅葛·创世》说，天地是天神格兹的儿女们造成的，这是一群“创世者”的美好形象。他们以“伞”和“轿”的形状，用“蜘蛛网”做底子去造天和地，终于把天地造出来了。但是，地大天小。格兹天神便放三对野猪、三对大象去掘去拱，把地面拱出了“高山深沟”，天地才合了起来。此后，天神又“打雷试天”、“地震试地”，天地震出了裂缝和窟窿。天神用“云彩”补天，用“地瓜叶”补地。天地摇摇晃晃，他又以“公鱼”、“母鱼”支地角，以“虎骨”撑天，天地才稳了起来。格兹天神和他的儿女们是那样的可爱，为了给人类创造生息之地，他们有着多么强烈的责任感啊！

手写本彝书《查姆·天地起源歌》描绘了另一幅图景。该书说，天地是由黑埃罗波赛神生下的一只“蛋”变成的。这蛋分三层，蛋皮变成了天，蛋白变成日月、星辰，蛋黄变成了地。地有四只手撑住天，天有四只手拄着地。这个故事与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颇为接近。

凉山地区的《勒俄特依》，保留的彝族开天辟地神话最为完整。它说，天地未分之时，“混沌”一片。天神恩体古兹召集了斯兹底尼等四神，会同“铁匠”阿尔师傅开辟了天地。阿尔师傅用九口“铜铁锅”做原料，制作了工具，才分开了天和地。九位女神用“铜铁扫帚”扫出了“蓝茵茵”的天，“红

艳艳”的地，还扫出了“撑天柱”、“拉天梁”、“压天石”。九位男神以“铜铁斧”见高山就劈，见深谷就打，平出了地面，世界上才有了牧羊、放牛、栽秧、种养、打仗、流水、住家的地方。

《阿细的先基》说，有两种“云彩”，轻云飞升，便有了天；重云落下，便有了地。

开天辟地在彝族神话中，或者以“蜘蛛网为底”造出，或者由“蛋”生成，或者靠铁匠神锤打而成，或者由“云彩”变成。甚至，还有的说是某神仙“吼”出来的。真是想象奇特，色彩瑰丽。这些神话中的天地，都需要支撑，似乎又与生活中的“起梁盖屋”有着某种形象上的联系。在先民们看来，造天造地，无非给人类一个居住之所。这正是彝族祖先的观念。而且，天地的开辟，神仙们往往历尽了艰辛，充满着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格兹天神的儿女们以“彩云”、“青苔”为衣，以“露水”、“泥巴”为粮。黑埃罗波赛神死后，眼变日月，齿变星星，乳房变成山脉，呼气变为风雨云雾。阿尔师傅开天时，“以膝盖做砧磴，口腔做风箱，拳头当铁锤，手指做火钳”。他们这种献身精神，受到彝族人民世代代的景仰。这种精神与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以照亮人类，竟是一脉相通，为我们探讨早期人类的精神世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想象力是神话形成的本质要素。彝族神话中天真、纯朴的想象，虽千姿百态，荒诞离奇，但它确“符合于原始信仰和原始生活”，可以算得上是一些“不可诬的真的神话”（茅盾语）。